

#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村落变迁

——以贵州 9 个少数民族村落为典型

罗贤贵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建设加快,在“土地倒逼机制”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推拉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地区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他们所获经济收入不仅为摆脱贫困、提升家庭成员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提供了基础保障,而且在与城市文明和其他民族群体交流互动中,其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发生了变化。同时,民族村落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动,导致民族村落自身人力资源匮乏。在劳动力紧缺和经济收入增加双重因素推动下,人们开始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少数民族村落传统农业生产、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

**关键词:**流动;变迁;少数民族村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7-083-087

DOI:10.13713/j.cnki.cssci.2015.07.014

## 一、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

### (一)问题意识

村落作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之一,其研究自引进到中国便受到加倍关注,费孝通、吴文藻等老一辈社会学人通过对中国村落的研究开启了学者们着力于农村社区研究的热诚,村落作为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载体,“村落变迁”反映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近年来学界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村落变迁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归纳起来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城市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发展主题展开的“城市化发展与村落变迁研究”(桂华,2011);二是以城乡结合部即“城中村”、“城郊村”为研究对象,从农民身份、职业转变以及社区管理等方面进行的“村落变迁研究”,其中以李培林教授提出的“村庄的终结”假设为典型(李培林,2004年);三是以经济发展、企业入驻改变村落结构,促使村落变迁为视角开展的实证研究(张红,2011年第4期);四是其他一些学者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体育等非物质为研究对象开展的纵

向实证研究(吴忠军 吴少峰,2013;阿思根 赵晓辉 张丽红,2010)。从这些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对农村变迁研究方面主要是从国家政策、市场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等较为宏观方面来分析和阐释村落变迁,以人口流动作为动力机制探讨村落变迁的研究较为少见,特别是以人口流动与少数民族村落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研究,目前关注的人比较少。但事实上,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村落人口在贫困、土地倒逼等因素推动下向外流动已成为一种常态,大量民族精英群体流出,给少数民族村落带来了什么变化,特别是在村落农业生产、民俗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相比是否发生了变迁?带着这一问题,笔者通过对贵州省 9 个少数民族村落进行实地调研,重点从少数民族村落人口流动作为观察视角,来探寻民族村落在大量民族精英流出情况下,在农业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迁。

###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采取立意抽样,选取了贵州黎平县大寨

村、黎平县地青村、荔波县瑶埃村、织金县白老脚村、威宁县交河村、威宁县雄跨村、务川县田村村、天柱县老海村、沿河县石泉村等世居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 9 个村,抽取 110 户流动人口家庭和 20 位少数民族居民作为调研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共发放社区问卷 9 份,家庭调查问卷 120 份,深度访谈 20 人,其中有效回收社区问卷 9 份,回收率 100%,有效回收家庭问卷 11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6%<sup>①</sup>。

## 二、村落基本情况

贵州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交汇的大走廊,现有 40 多个民族,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村落大多位于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交通、信息封闭,公共基础设施落后,9 样本民族村落中村民居住于山区的占到了 55.6%,深山占 33.3%,丘陵和山区占 11.1%;村落交通设施较差,44.4%仍是土路,11.1%简单用石子铺设了道路;9 个民族村落公共教育资源匮乏,基本没有设置学前教育机构,3 个村即交河村、

老海村、雄跨村没有小学,所有村都没有中学;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滞后,部分村落还没有村卫生室,所有村落都没有专业医疗人员。为了摆脱贫困,提高家庭成员物质生活水平和福利,民族村落大量青壮年劳力选择进城务工。调查显示 9 个民族村共有人口 15549 人,少数民族人口 12950 人,在外务工人员 4392 人,其中男性 2516 人,占 62.25%,女性 1876 人,占 37.75%;流动人口中“已婚”人员是主流群体,占总数的 64.08%，“未婚”34.73%（其中“未婚”男性占 26.95%，“未婚”女性 9.58%）；流动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 18—49 岁,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向外流动的主要群体,占 90%以上(见表 1)。随着大量民族村落青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动,流动家庭经济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调查显示 2012 年 9 村落经济总收入 4288.83 千元,其中劳务输出收入 2929.8 千元,占到总收入的 68.31%,农业收入为 340.69 千元,只占到总收入的 7.94%,其中大寨村劳务输出带来的经济收入占总收入比例高达 93.1%(见表 2、3)。

表 1 2012 年民族村落流动成员与留守成员年龄统计(%)

	60 以上	50—59	40—49	30—39 岁	18—29 岁	18 以下
留守(N=170)	12.35	27.06	31.76	11.76	15.29	1.76
流动(N=167)	0	1.8	20.36	29.34	41.92	6.59

表 2 2012 年调查样本村农业收入与务工收入(千元)

	总收入	农业总收入	农业人均收入	农业收入所占比例	打工总收入	打工人均收入	打工收入所占比例
石泉村	856.62	97.55	5.74	11.39%	582	25.3	67.94%
雄跨村	439.9	37.5	3.13	8.52%	345	15	78.42%
老海村	586.4	24.4	0.74	4.16%	233.6	15.57	39.84%
交河村	359.3	31.9	1.28	8.89%	164	13.67	45.64%
瑶埃村	208.3	38.5	1.83	18.48%	134.2	8.95	64.42%
田村村	617.49	33.54	2.22	5.43%	544	34	88.09%
白老脚村	495.71	33.29	2.23	6.72%	302	16.78	60.92%
地青村	347.05	29.95	1.66	8.63%	273	16.06	78.66%
大寨村	378.06	14.06	0.88	3.72%	352	12.57	93.1%

表 3 2012 年民族地区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千元)

收入	15 以下	15—35	35—55	55—75	75—95	95—115	115 以上
打工(N=97)	23.71	47.42	17.53	7.22	3.09	0	1.03
农业(N=88)	95.45	4.55	0	0	0	0	0
畜牧养殖(N=57)	92.98	5.26	1.75	0	0	0	0
人情(N=20)	70	20	10	0	0	0	0
政府福利(N=29)	100	0	0	0	0	0	0
子女供养收入(N=7)	85.71	14.29	0	0	0	0	0
土地出租(N=10)	100	0	0	0	0	0	0
投资分红(N=3)	66.66	33.33	0	0	0	0	0
他人赠送(N=8)	100	0	0	0	0	0	0
其他(N=21)	57.14	28.57	14.29	0	0	0	0

① 文章中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数据均来自本次调查统计。

### 三、流动与变迁

在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因战争、政治、经济等因素,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经历从北到南远距离、长时间的流动与迁移,最后逐渐在贵州各地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稳定居住形式,流动与迁移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稳定而封闭或半封闭生活所取代。少数民族群体大多居住在山区、高寒山区或深山区,地理环境特殊,可耕地资源有限,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教育等条件有限,与外界交往困难,商品经济落后,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正如何明在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前的少数民族社区与汉族农村社区相比,除个别民族外,社会的封闭性更为突出,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血缘性、亲缘性、族缘性和地缘性特征即机械联系,族缘和地缘交错而成的空间基本划定了其社会交往的边界<sup>[1]</sup>。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滞后的农村经济无法实现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他们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地区从事非农业劳动。这些流向城市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大多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懂汉语,有一定非农业劳动技能,是少数民族村落生产劳动的主力 and 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地方民族精英和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的掌握者,同时也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与表演者,在民族村落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群体大量外流,在与其他城市现代文明碰撞中,在获取非农经济收入的同时,其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也渐渐发生改变,这些观念和行为习惯必然会反射到少数民族村落,给民族村落传统农业生产、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带来较大改变。

#### (一) 农业生产变迁

一般认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意味着我国现代农村社会改革的开端,中国的农村在真正意义上彻底推翻了原有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开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中国的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sup>[2]</sup>。居住在贵州的各民族,虽然在先后经历的“改土归流”、土改运动、农业合作化等活动中获得了一定土地耕种,但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是直到1982年底,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重新调动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们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是少数民族农业生产在建国以来一次重大飞跃,从此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开始了他们的传统农耕生产种植活动,过着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封闭或半封闭生产劳动方式。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土地倒逼模式等多重因素推拉下,民族村落中的人们为了摆脱贫困,大量青壮年劳

动力纷纷走出山区,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导致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失,留下“老弱病残妇儿”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弱势群体不得不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以适应劳动力缺失带来的生产劳动问题,从而引起了民族村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改变。

#### 1. 农业生产

少数民族村落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各民族在农业种植过程和农具使用上经过先民多次改革创新,流传至今,各民族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使用上虽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民族村落传统农业种植大致都要经历“耕——种——肥——收”的基本过程,且这些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十分复杂的工序。如以粘稻和糯稻为主的布依族在农业种植过程中会把耕、种、肥、收每个环节做得十分细致。耕:秋收后,部分田要放水进去用牛耕犁翻,整个冬天让水泡着,到春天再次牛耕翻犁翻耙才能下种或插秧。种:选种,要在稻谷熟透未收割时,傍晚无露水并且日晒不烈时,到稻谷长势最好的田选取好的谷穗,用摘刀去下,连同穗茎一同捆成把,单独晾晒保存。肥:秧田需先施牛圈肥,后施秧青(嫩草叶、艾蒿等)翻犁耙后播种,“晒秧”后施人畜粪肥。收:稻谷泛黄,放干田水,三至七天后开镰收割。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耕作工具除铁制部分以外,其他工具全部是自制,主要有犁、耙、翻耩、挖锄、板锄、薅锄、钉耙、摘刀、柴刀、斧头、木制挞斗、竹编撮箕、竹编箩筐、麻袋、扁担、竹席。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村落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紧缺,农业生产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传统牛耕和自制工具的使用向现代机械化农具转变,以柴油(汽油)为动力的犁田机、打谷机等小型农机用具开始取代传统的耕牛、挞斗等,大部分家庭已经不再饲养耕牛;二是耕作程序简化,秋后耕翻、泡水、晒秧、施农家肥等传统生产环节被现代科技的除草剂、化肥等取代,传统生产过程正逐渐在消失;三是种子、农具等越来越依赖商品市场,产量高的杂交种子,方便好使的现代农具直接从市场上购买,不再是自己制作;四是种植面积有所减少,种植从一年四季种植变化为只种春季主粮,油菜、小麦、大豆等辅助作物较少种植。这种变化首先是与民族村落中现存人员结构有很大关系。大量劳动力流出后,村落中基本是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弱势群体,他们无法进行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只能采取结构单一、操作简单的“毛种”方式(土地不用耕、翻,直接将种子或种苗种在未经任何处理的土地里,任其自然生长);其次是由于大量劳动力流出,家庭劳动力成员减少,无人看管耕牛、家禽等,导致大多数家庭不再饲养耕牛,家禽养殖数量减少,农家肥也减少;第三是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所提供的非农收入,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为购买农机用具、科技化肥、种子等提

供了资金保障。

## 2. 职业身份

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在一个打工经济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打工成为村民主要职业的传统村落里，职业和观念的转变必然引发传统村落“终结”的漫长过程，而这种“终结”则结束于村落传统和村落关系网络的瓦解<sup>[3]</sup>。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转变，世代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在流入第二、三产业，被城市人冠以“农民工”称谓身份的同时，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其实也包含了技术人员、工人、商人、服务人员等多类型职业。调查显示：外出务工前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方面，前往城市地区务工的少数民族职业技能得到很大提高，从务工前参加培训的 4.9% 提高到了外出务工后的 8.82%，针对农村进行主要针对农业种植方面技术而言，到城市以后其职业技能培训种类增加（见表 4），实用性与市场需求较好，给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在城市就业提供

了技术支持。同时 9 个村调查数据还显示：在外流动人员在建筑类行业或相关企业从事体力劳动者占 59.80%，在个体户服务的 19.61%，在小作坊中从事生产、加工操作人员占 13.73%，和传统少数民族农民相比身份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过程中与其他非本民族成员进行交流互动，原本以自然村落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为繁衍基因，反映村落群体人文意识的社会文化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部分返乡人员，因各种原因不再外出务工，便开始在村落从事专业农耕服务，专门为那些劳动力缺乏家庭提供耕地、播种、收割等一系列劳动服务，进而形成了“劳动工具+劳动力出租=收取工钱”的现代农业经营服务模式。与此同时，部分留守妇女开始组建农村家政服务队，为村落提供各种“餐具+厨师+服务员”的“酒席需求”服务。这些服务工作不仅改变了传统少数民族村落单一的农业职业模式，更为向城乡一体化迈进提供了前提条件。

表 4 劳务输出前后职业技能培训情况 (%)

外出前是否参加过培训(N=102)					
是	4.9				
否	95.1				
外出后是否参加过培训(N=102)					
是	8.82				
否	91.18				
培训技术内容		培训性质		培训时间	
电子手机类	20	所在单位组织	66.67	1个月以下	11.11
焊接	20	自己花钱学	33.33	一个月	44.44
纺织	20			一个月以上	44.45
洗烫衣服	20				

## (二) 风俗习惯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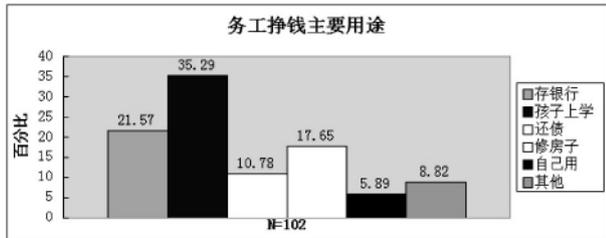
罗吉斯,埃弗里特等曾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其内涵极为丰富,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等多个方面的变革。社会变迁的发生单位可以是社会系统层次,也可以是个体微观层次<sup>[4]</sup>,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流动流向城市,在人口流出带来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村落传统生活方式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因村落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而导致内部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村落中完整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的失衡;另一方面,非农经济收入促进家庭经济收入增加,为家庭物质生活条件改变提供了经济保障;第三,由于留守在村落中的大多是妇幼老弱群体,乡村生活变得不完整,民族精英群体承载的缺乏,而导致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出现断裂、失传、瓦解的趋势。

### 1. 居住建筑

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不仅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

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重要反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随着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以及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各民族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村落的居住方式正在发生变迁。对 9 个民族村落史料查阅和深度访谈证实,定居于各民族村落的居民在传统建筑结构上大多采取就地取材,以竹、木材、石头、茅草等作为建造房屋的主要材料,再依据各民族风俗文化、居住地理环境等因素,建造出各民族格局风格的房屋。如苗族的住房建筑大多用木头、石板或土墙草房等,住房多位于山脚、山腰修建“吊脚楼或半吊脚楼”;布依族主要采取竹木结构的“干栏式”住宅建筑;侗族大多依山傍水,蓄有古树做“风水树”,以木材为材料的“干阑”楼房,村四周布鱼塘。但如今,少数民族村落中居民住房结构与传统相比已经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小洋楼正在取代传统民族风情建筑,居民如有新建房屋,主要是以新修混凝土小楼为主,传统竹木住式住宅基本不再新建。在访谈中提到新建房屋风格时,一位正在修建新房的村民描述道:“现在都没有

人修老式房了,新楼好看又气派,和城里人住的一样。”调查数据显示,仅在2012—2013年9个村在外出务工家庭把经济收入主要投入到建设新楼中的占到了17.5%(如图表1),且21.57%的家庭把务工收入存入银行,打算在未来几年内修建新楼。<sup>①</sup>



图表 1

## 2. 习俗

村落文化是指以自然村落的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为繁衍基础而产生的能够反映村落群体人文意识的一种社会文化。村落文化是基于土地而诞生的,属于农业文化的一种,村落文化反映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村落是“道义的权威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习俗和生活方式是展现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的最佳方式和载体,同时也是区分和鉴定不同民族之间差别的重要依据。不同民族因服饰、饮食、婚姻、丧葬、节日宗教等方面独具特色,习俗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民族村落向外流动人员不断增加,传统习俗文化已经开始发生变迁,且一些传统习俗、节日庆典活动以及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如苗族的姊妹节、爬坡节、种棉节、吃新节等,因大量劳动力流出,这些节日基本已经不再举行,即使有些村落仍在举行,但形式较为简单,内容和重视程度已远不如以前,参加人数很少,基本是年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如布依族男女以对歌结识的婚恋关系——“榔绍榔貌”,婚酒期间新娘新郎不同宿等已经消失。现在布依族村落中的青年男女,他们在进入城市地区打工后,受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以及在与其它民族群体交流互动过程中受到同化,传统婚恋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外出务工青年男女认识后,一旦确定恋爱关系,如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他们便过上同居生活。调查中发现,不仅在布依族中外出青年男女有同居行为,其他民族在外务工青年男女也较为普遍。访谈中一位苗族年长老人说道:“现在的年轻人啊,变了,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小孩都有了才回来办酒也无所谓”;再比如侗族

合唱的大歌,以及伴奏的琵琶、牛腿琴、侗笛、芦笙、芒筒、木叶等大部分年轻一代都不会使用,更不会制作,仅成为年长老人的美好回忆。

## 3. 生活方式

少数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流动不仅是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发生了较大变迁,同时因外出务工所带来的非农业劳动经济收入,给民族村落家庭成员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上提供了保障,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生活已逐渐走向市场化,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和子女教育得到较大改善。从9个村调查资料显示,民族村落家庭成员非农业经济收入中主要用于改善家庭成员生活条件,34.6%的家庭修建了独立卫生间,10.9%的家庭安装了电热水器,89.1%的家庭已经使用上了电话,50%以上家庭使用上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等。同时,子女教育随着外出务工所带来经济收入及价值观的改变也发生了变化,当前子女教育开支已经占据了外出务工家庭经济收入的绝大部分,其比例高达56.84%,其中用于子女当前教育费用的占35.27%,用于子女将来教育打算的占21.57%,这既体现了少数民族家庭对子女教育观念的转变,同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经济条件的改善。

## 四、结束语

从社会发展来看,民族村落变迁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人口向外流动助推了村落变迁速度,特别是农业生产、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为推动村落整体变迁提供了可能,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村落大量劳动力向外流动在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使民族村落在社会结构完整、传统文化传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1]何明. 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综述[J]. 思想战线, 2009(1):29.
- [2]刘杰,向德平. 城市化推进下的“村落单位化”:渊源、条件及社会风险[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6):53.
- [3]张红,李霖,孙玉娜. 一个传统村落的变迁——陕西省吴旗县白豹村的实证研究[J]. 新观察, 2011(4):31-32.
- [4](美)罗吉斯,埃弗里特,等. 乡村社会变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12-18.

[责任编辑:明秀丽]

① 新楼指在9个民族村中,村民新建的现代混凝土结构平房,一般有1—3层,多数家庭以修建2层为主。